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歌 德

人 民 出 版 社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歌 德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629

次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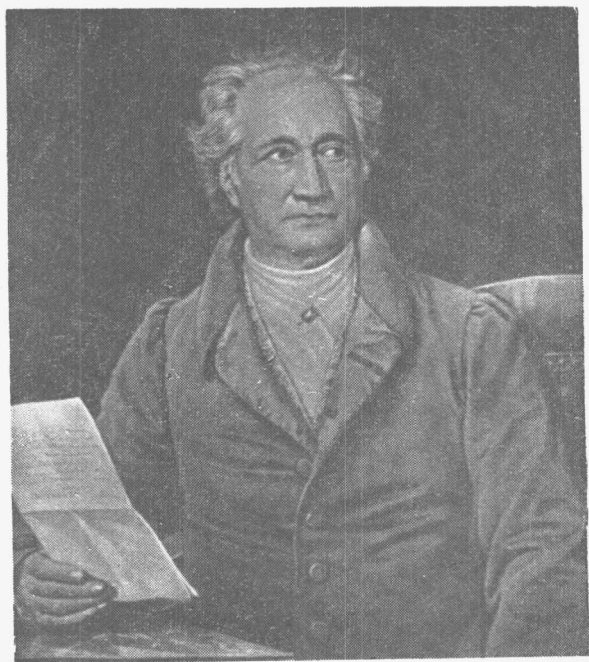
著 者： 臧 之 遠

出版者：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 新 華 書 店
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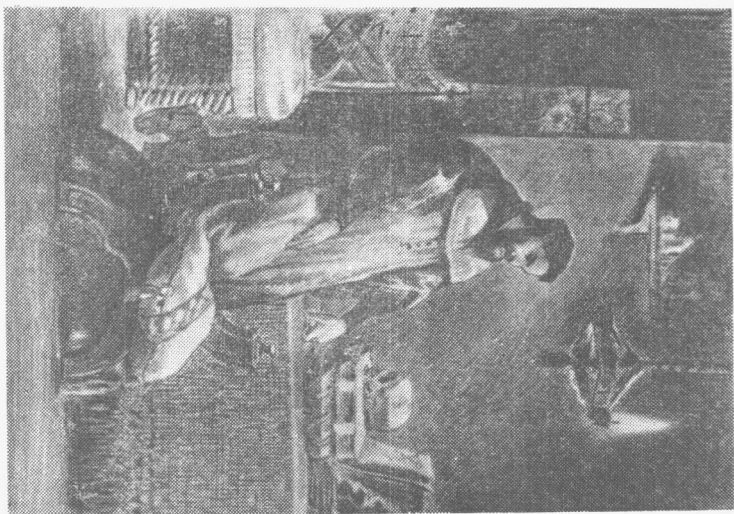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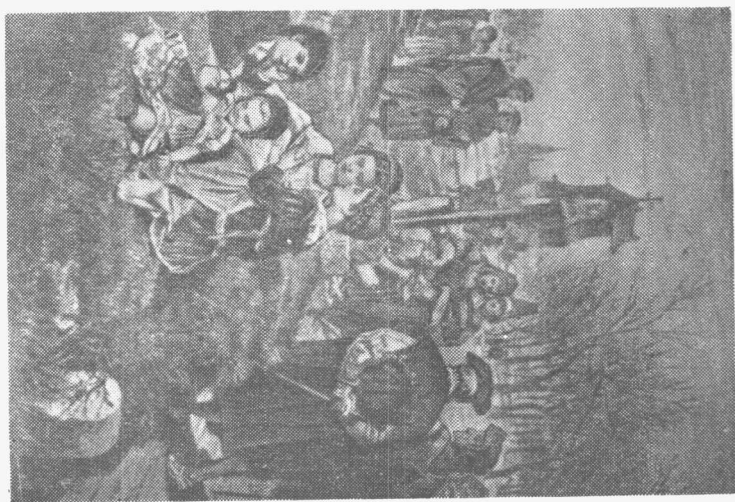


歌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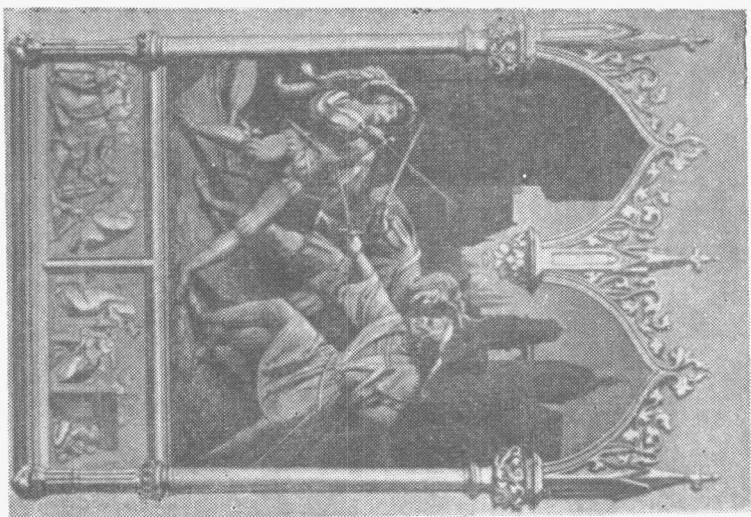
施蒂勒爾作。一八二八年。



歌德的詩劇《浮士德》插圖。
畫家德拉克魯阿作。



歌德的詩劇《浮士德》插圖。
畫家里岑·邁萊爾作。



歌德的詩劇「浮士德」插圖。
畫家梭別爾萊作。



歌德的長篇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插圖。
畫家霍達維萊基作。

約翰·伏爾夫康·歌德（一七四九——一八三二年）是偉大的德國詩人兼思想家。他的文學活動的意義是巨大的。歌德把自己的活動與十八世紀後半期及十九世紀初葉起源於西歐並波及德國的歷史變動的時代結合了起來。一八二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歌德告訴他的秘書埃爾曼說：「我誠有莫大的得天獨厚之處，因為我生長在這樣的時代：一些最偉大的世界性事變在這個時期發生了，同時這些事變在我漫長的一生當中沒有中斷過，因之我目睹了七年戰爭、美國脫離英國而獨立、後來的法國大革命，以及最後的整個拿破崙時代——直到英雄之死與接踵而來的一些事件。所以我得出的結論與觀點，在那些現今剛剛出世而必須從隔膜難解的書本上來領會這些偉大事變的人們看來，是全然不可理解的。」（埃克爾曼：「與晚年的歌德談話錄」，莫斯科—列寧格勒一九三四年俄文版，第二一〇——二二一頁）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一些事變，與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之轉變過程都是息息相關的，這些事變賦予了文學以新的內容。它們將各國人民歷史運動的題材和民族特性的觀念提到文學中的首位。在科學方面，這個時代與十七——十八世紀機械論的自然科學的危機是有聯系的。在哲學方面，這時辯證法的萌芽產生了，儘管這種辯證法的形式仍在變化不定中，並且是唯心的。所有這些，使得歌德——這一時代先進的天才之一——超越以前的德國

文學，向前大大地邁進一步。

歌德於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誕生於美茵河畔古老的帝國城市法蘭克福的一個富裕的市民家庭裏。歌德是在一個經濟薄弱、社會和政治都很落後的封建割據國家的環境裏長大的。恩格斯論及十八世紀德國時寫道：「這是在腐朽瓦解的一堆……一切都腐敗了，動搖了，就要傾圮了，甚至毫無良好轉機的希望了，因為人民沒有能以清除垂死制度的腐尸的力量了。」（恩格斯，「德國狀況（第一封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六——七頁）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歌德生活於其時——的偉大事變，幫助歌德認識了德國陷於悲慘境地的一些原因：封建壓迫，民族不統一，人民缺少積極性，貴族的世界主義文化的統治。繼萊新以及另一些德國市民階層進步代表的活動之後，歌德的作品中充滿了反抗精神和對當時整個德國社會的憤慨情緒：「從政治與社會的觀點來說，這是一個可恥的時代，但同時却是德國文學的偉大時代。」（同上書，第七頁）小小的城市共和國也具有十八世紀德國共通的落後性。歌德的出色才能和廣泛興趣使他成爲當時最有教養的人物之一。一七六五年歌德進入萊比錫大學研究法律和語言學，他深深感到當時大學學科的狹隘和無用。他的文學活動就是在萊比錫開始的。早期的抒情詩歌及詩劇（牧歌「戀人的脾氣」，一七六九年寫成，一七八七年發表；喜劇「同犯者」，一七六八——一七六九年）還帶有模仿時髦的法國宮廷文學的痕跡。

歌德因病在故鄉住了兩年，於一七七〇年前往施特拉斯堡繼續求學。他在這裏讀完大

學，同「狂飆運動」理論家赫爾德爾過從甚密，此後許多年中這個運動便由他所領導。這是歌德一生最重要的時期之一。他內心充滿了對停滯不前的德國社會基礎之反抗的思想，他成了爲獨立自主的民族文化而奮鬥的戰士。歌德與赫爾德爾共同反對古典主義的虛擬美學法則，同時也反對客廳抒情詩的矯揉造作及海勒特式的狹隘啓蒙學者的迂腐習氣。他重視民族傳統，推崇漢斯·薩克斯——十六世紀手工業者同業公會的詩人——並寫了一篇「論德意志建築」（一七七二年）的論文。莎士比亞的強烈現實主義及民族歷史題材使歌德尊他爲導師（論文「莎士比亞紀念演說詞」，一七七一年）。「狂飆運動」力圖使人掙脫落後的封建市民社會的謹小慎爲的道德規範。這一學派的多數詩人（所謂「狂蕩不羈的天才」）只能抽象地擬具的觀念，在歌德的作品中却得到天才的發揮。歌德在一七七〇——一七七五年間所寫的絢爛而情感洋溢的抒情詩，應該在德國文學中佔着首要的位置。由於歌德克服了十八世紀敘事詩之虛擬唯理形式，由於他接近了民間歌謠的緣故，他成了近代德國抒情詩的創始人。對自然界的深厚感興，詩與哲學思想的融合，使用韻律的大胆、豐富——這就是青年歌德的抒情詩的特色（「五月小調」、「暴風雨中旅人之歌」、「歡會與離別」、「野薺薇之歌」等），對於體裁較宏大的作品，歷史背景和英雄形象是必不可少的。歌德爲了探尋英雄人物，曾潛心研究歷史（蘇格拉底、愷撒、穆罕默德、葛茲·白里興根），研究古代神話（普羅密修士）和德國民間傳說（浮士德）。他在這些構思中，成功地完成了那些以本民族的歷史爲基礎的主題（詩劇「葛茲」，一七七四年；較後的「浮士德」初稿，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

在「普羅密修士」(一七七三年寫成，一八三〇年發表)的斷片中，在詩劇「葛茲」中以及「浮士德」的早期文稿中，鮮明地表現了青年歌德憤激的反抗建情緒，——這是他對十八世紀德國沉悶氣氛的抗議。歌德在詩劇「葛茲」中把注意力貫注在十六世紀農民戰爭的時代——德國歷史上最動盪的時代之一。歌德把自己的英雄人物理想化了，他把葛茲——反對派騎士代表——寫成一個為先進的民族主義的理想而奮鬥的戰士和人道主義者。雖然這樣，劇中却含有很多歷史的真實性，尤其是在描寫十六世紀革命時代的廣闊社會背景方面。民族統一的思想——歌德此後從未放棄這種思想——最先通過這篇詩劇出現在他的作品之中。作為打破了古典主義戲曲的傳統規範的現實主義「莎士比亞」型詩劇，「葛茲」具有巨大的革新的作用。

書信體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一七七四年)給歌德帶來了世界性的聲譽。歌德成功地賦予了書中主人公不幸的戀愛故事以巨大的社會意義與悲劇情調。這裏對等級成見、德國市民之封建守舊性和自私性的批判，與妄想實現在當時德國情況下不能實現的社會上充滿的生活和事業之意圖融合在一起了。維特，按照普希金的話來說，這個「反叛的受難者」，給予他當時所處的社會以深刻的影響；通過他反映着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夕緊張的社會矛盾。在守舊的環境裏找不到出路的維特之自殺，彷彿是青年歌德的世界觀開始驟變的標誌。恩格斯寫道：「就是人民中間最優秀最堅強的才智都對本國前途喪失了任何希望。」(恩格斯，「德國狀況(第一封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五卷，第七頁)

德國與法國——伏爾泰和盧梭的國家——不一樣，那時尙無革命的資產階級階層。連德國市民階層中間最有教養的團體都還對君主專制抱着幻想，而且忠心耿耿地尊崇貴族和公侯的權勢。這一切都是「狂飆」文學運動驟變的原因，而且這一切不會不反映在這位天才德國作家的著作中。恩格斯論歌德道：「他心裏經常進行着天才詩人與法蘭克福市參議員的謹慎的兒子或威瑪的樞密顧問官之間的鬥爭；前者對於環繞在他四周的鄙陋抱着嫌惡的心情，後者使自己必須和它妥協，適應於它。因此，歌德有時候是偉大的，有時候是渺小的，他有時候是反抗的、嘲笑的、蔑視世界的天才，有時候是拘謹的、滿足於一切的、狹隘的小市民。」（恩格斯：「論歌德」，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第四〇頁）在歌德的生活及精神發展的所謂威瑪時期當中，這些根本矛盾開始特別有力地出現於他的作品中。歌德於一七七五年接受撒克遜——威瑪公爵卡爾·奧古斯特之邀請，到了威瑪公國，從此即與它保持着聯系直到逝世。一七七六年六月，歌德担任部長及樞密院顧問官。歌德在這個小國的疆域之內，努力滿足自己的事業心；他整頓財政，裁減軍隊，恢復停頓的礦山工作，修築道路，創建劇院，襄助大學。可是這些有損封建制度的重要改革遭到了公爵的反對。

對激發德國市民階層積極參加公民活動之可能性感到失望，使歌德擯棄了「狂飆運動」狂蕩不羈的情緒；然而這位偉大詩人對公爵專制獨裁妥協的傾向與保持和發展現實主義因素，與更深入掌握歷史的經驗糾纏在一起了。歌德在整個威瑪時期對於以革命方法解決德國

實際生活問題抱着冷淡的態度。他力圖把他那自由積極的個人人道主義理想體現出來，而避免與周圍的社會環境發生革命衝突。他這幾年的抒情詩唱的都是些超然啦、和諧啦、寧靜啦這類的調子（「人類之極限」，一七七九年脫稿；「旅者的夜歌」，一七八〇年）。由於行政事務和宮廷職務的繁忙，他寫作甚少，許多創作的構思都未能實現。

然而在寧靜的外衣裏面，却蘊藏着詩人深深的不滿情緒。一七八六年歌德逃脫威瑪宮廷之困頓，到了意大利羅馬。他在這裏主要是與一些藝術家們交遊往還。歌德本人也從事繪畫，臨摹古代藝術及文藝復興時期藝術的範本。在意大利，他繼續了在「狂飆」時期即已開始的自然科學研究。歌德對大自然的探究鞏固了他世界觀的唯物主義傾向，這種傾向是與斯賓諾莎的哲學相接近的。他學習着把世界看成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來認識世界，他把歷史發展的思想引用到生物、地質等自然科學問題裏面來。他對於自然科學的研究是和他的藝術創作與他的現實主義深刻地結合在一起的。歌德在意大利改寫了或完成了他早已動筆的幾部文學作品（「哀格蒙特」、「塔索」、「伊菲季尼在陀佛立斯島」）。早在法蘭克福開始寫的詩劇「哀格蒙特」（一七八八年）是「狂飆運動」思潮的餘音。這篇氣壯山河的作品充滿了熱愛自由和強烈反抗一切民族壓迫的思想，這篇作品證明了這類的思想對於威瑪時期的詩人是並不隔膜的。

所謂歌德的威瑪古典主義前提在意大利旅行時期已經形成了，這次旅行對歌德的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這次旅行使詩人接觸了鮮明多彩的人民生活之生動泉源，這樣的生活是與宮廷生活的枯燥無味、官僚生活的迂腐習氣截然不同的。歌德以在意大利度過的幸福時光之回

憶，寫成「羅馬哀歌」（一七九〇年），這篇作品本質上對於禁慾主義、宗教習俗和市民道德之惡毒煙幕是深深仇視的。

在意大利旅行期間，歌德重新審查了「狂飆運動」詩人們好高騖遠、力求「驚天動地」的意圖。歌德此刻覺得這個運動所特有的個人主義，無寧是病態的、不無瑕疵的現象。按照溫克曼精神來理解的古代藝術，即作為純樸、寧靜、和諧之表現的古典藝術，變成了歌德的理想。歌德依據溫克曼對古代奴隸制民主的理想化，給自己創造了「優秀人類」的抽象形象，德行和美好的範例。十八世紀九十年代，這種威瑪古典主義的美學及渴望德國民族發展的思想，有力地促使兩位偉大的德國詩人——歌德和席勒接近起來。歌德跳進了抽象之美的圈子裏，這不能不使他同現實生活的醜惡現象妥協。妥協的傾向最有力地表現在悲劇「塔索」（一七九〇年）中：歌德起初將自己的主人公寫成反叛者，就是說還保持着「維特式的英雄人物」的舊傳統，可是他終於使這個英雄人物對菲拉爾宮廷崇拜起來。替代以前「狂飆運動」的狂蕩不羈情緒，在歌德威瑪時期的作品中，常居上風的是關於自我剋制的庸俗說教。對現實妥協的傾向在這一時期也出現於詩人其他一些較短的作品中（「溫和的警句」、「化裝跳舞會」，為威瑪宮廷劇院——歌德會任這個劇院的經理和導演——寫的一個劇本）。

儘管這樣，歌德的威瑪古典主義却有其重要方面。古希臘的形象對藝術家歌德說來，是唯物的處世態度的表現，是對一切神秘主義與宗教盲信的否定。偉大詩人即在古代藝術的理想中，還懷着對健康的、積極的、社會的人的崇拜。歌德對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習尚的

批判，具體表現在理想化的古代形象中；他早在「維特」時期就已開始了這種批判，而在後期的作品中進一步把它發展了。這樣的主題同歌德的威瑪古典主義有機地聯系着，它在詩劇「伊菲季尼在陀佛立斯島」（一七八七年）中表現出來了；詩劇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被表現為充滿罪惡的野蠻的生活自發勢力——這種自發勢力在詩劇中是與女主人公的意志相對立的。然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主題中，脫離現實的生活材料也是預先為威瑪古典主義的唯心美學所決定了的。整個來說，歌德的古典主義不應拿來與法國舞台上及專制獨裁國家文學中起主導作用的、曾為萊新嘲笑過的理性主義風格混為一談。歌德的美學力求全面包括一切生活矛盾，力求表現民族史和世界史上社會鬥爭的戲劇性。

一七八八年歌德回到德國之後，便擺脫了行政職務。他和威瑪宮廷社會的關係逐漸疏遠起來。歌德繼續研究自然科學，整理意大利印象記，將「浮士德」（一七九〇年）斷片付印。由於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事變的結果，在歌德面前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歌德自以為有充分洞察力去估價它們的歷史意義。在威瑪公爵對革命的法國進軍之際，歌德侍從在側，他在瓦爾彌附近戰場上（一七九二年）說過：「從此時此地起，世界歷史即將開始一個新的時代」（「法蘭西戰役」）。歌德雖深知這次革命的意義，可是他對它却抱着否定的態度。這次革命打破了他已具雛形的理想——依靠階級親善、科學技術之進步、藝術之道德教化臻至和平發展的理想。歌德認為現存社會罪惡的危險程度並沒有像羣衆反對反動社會制度的暴動那麼可怕。歌德願意接受拿破崙的資產階級法律制度，可是他不接受以正在鬥爭的武裝農

民爲代表的革命，他在不成功的喜劇「市民將軍」（一七九三年）中嘲笑過這種農民。他鄙夷地評論「自由的使徒」（威尼斯警句，一七九〇年）。歌德把階級和平共處的田園詩歌（「叛亂的人們」，一七九三年寫成，一八一七年出版），把關於建立在貴族和資產階級合作基礎上的德國特殊發展途徑的空想，同革命鬥爭的思想對立起來。貴族對法國革命之反動，在許多方面都是造成這一時期德國文學孱弱的方面的原因，這種反動也波及了歌德。他在長詩「赫爾曼與竇綠苔」（一七九七年）中，把法國革命的人民的歷史功績同德國窮鄉僻壤的宗法式的、仿效古代史詩格調的田園詩歌對立起來。

歌德和席勒一同提出美學教育的唯心綱領，作爲反對封建猖獗及革命恐怖的手段，這反映了德國階級鬥爭水平之低落，反映了他們親身拒絕與封建德國的反動勢力積極鬥爭的思想。這種空想美學超出歌德和席勒的小圈子，就蛻變爲御用古典主義。

歌德和席勒開始交好是在一七九四年。歌德參加了席勒創辦的刊物——「時代女神」雜誌（一七九五——一七九七年）及「藝術年鑑」（一七九五——一七九九年）的編輯工作。兩位詩人合作了許多諷喻小詩，用「簡短警句」（一七九六年）的總名發表，來反擊威瑪古典主義的論敵，痛斥庸夫俗子和尼古拉類型的小市民思想家。歌德與席勒通信集是了解十八世紀

• 「簡短警句」(Xenien, Koanun)，即以警句和格言組成的小詩，古羅馬詩人馬塞爾創製的體例。

—譯者

與十九世紀之際的德國文學和研究文學藝術問題的最珍貴的文獻。在這種合作之中，歌德的態度與席勒的態度畢竟是有區別的：歌德並不像席勒那樣沉醉於康德的唯心美學。恩格斯寫道：「歌德過於全能，他是過於積極的性格，而且是過於入世的，不像席勒似的逃向康德的理想去躲避鄙陋；他過於目光炯銳，不能不看到這個逃避歸根結蒂不過是以超越的鄙陋代替平凡的鄙陋而已。」（恩格斯：「論歌德」，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四〇頁）歌德的看法與席勒不同，歌德認為實踐——生活的真實基礎——是一切理論的試金石。由此可以說明歌德的現實主義終歸比席勒的創作體系更為優越。歌德是一個入世的、積極的、勞動的人。歌德在「浮士德」中說：「秦初有為」。雖說歌德不能始終一貫唯物地來解決哲學上關於存在和意識的基本問題，可是他畢竟揚棄了福音書上「秦初有道」這個教條。他的世界觀包含着歷史的樂觀主義和確信歷史矛盾向前發展的信心。描寫人民的現實主義和關於勞動的詩作，甚至貫穿於這一時期歌德的守舊作品中（「赫爾曼與竇綠苔」）。古希臘人的樂天主義世界觀，在以古代事蹟為主題的短詩中被提到首位——這是與基督教義背道而馳的（「柯林斯的新婦」，一七九七年寫成，一八〇〇年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也就是在這些年，歌德的注意力轉向描寫社會關係的長篇小說方面，雖然這是間接通過他對美學之探討得來的（「威廉·邁斯特爾求學時代」，四卷，一七九五——一七九六年）。他孜孜不倦地完成了「浮士德」第一卷的寫作，並在十九世紀初年創作了一個出色的劇本「城門近旁」，這個劇本明確着重地指出了詩劇的民族性內容。

法國人民的革命戰爭轉為掠奪戰爭及拿破崙的統治，這激發了德國民族情感的高漲。但是，處在王公貴族反動領導下的德國人民的愛國抗戰，在這裏是在反動的民族主義形式下進行的。這種民族主義在德國浪漫主義文學中得到了反映，德國的浪漫主義是在貴族對法國革命的反動的基礎上於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之際發生的。歌德是這一流派的堅決敵人。他認為德國浪漫主義者的反動幻想是「病態」藝術的產物。歌德指責浪漫主義者之陶醉於中世紀，「拋揄浪漫派之神秘論，嘲笑他們對人生「黑暗一面」之偏愛。偉大詩人對反動浪漫派與「絕望文學」之厭惡足以說明：歌德同落後的德國現實妥協的傾向，絕沒有使他的世界觀全部解體，在他的世界觀中永遠蘊藏着健康的現實主義種子。

歌德在拿破崙征戰時代所表現的態度屢次遭致邦人的責難，說他缺乏愛國心。歌德同拿破崙會晤過兩次，並接受了拿氏所賜的榮譽勳章。所有這些只能由當時社會環境的矛盾來解釋：法國的統治在摧毀德國封建落後性這一點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解放運動却含有十分明顯的反動民族主義成分，並且它還結合了維護中世紀殘餘的勢力。歌德是浪漫派反動的條頓崇拜狂的敵人，他才是本國優秀的進步的名副其實的愛國者。歌德在一八一三年說過：「人民自由和祖國，這兩個偉大觀念活在我們心裏，這種觀念是我們存在的一部分」（同路登談話錄）。在歌德身上，絲毫找不出與世界主義及否認民族特點的見解有任何共同之處。歌德認為文學是在四分五裂的國家裏使各民族獲致團結的重要因素。這種團結之實現是與統治階級自私自利的利益相抵觸的。一八二八年歌德同埃克爾曼談話中間講過：德國的偉大就在於它